



镜与灯人文译丛

新社会学想象力

The Ne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美] 史蒂夫·福勒 著 施丽华 译



镜与灯人文译丛

新社会学想象力

The Ne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美] 史蒂夫·福勒 著 施丽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社会学想象力/ (美) 福勒著; 施丽华译.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4. 10
(镜与灯人文译丛)
ISBN 978-7-5499-4460-6

I. ①新… II. ①福… ②施… III. ①社会学—科学史 IV. ①C9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4220 号

书 名 新社会学想象力
原 书 名 The Ne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作 者 [美] 史蒂夫·福勒
译 者 施丽华
责任编辑 陈爱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25-57572508)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4460-6
定 价 26.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镜与灯人文译丛”编委会

主 编：许 钧 吴文智

副主编：顾华明 朱永贞

编 委：许 钧 吴文智 顾华明 朱永贞
许 多 张 平 孙兴春

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翻译者与研究者,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大量外国文化,并深深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缤纷多彩、丰富浩荡所折服。在这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的浩浩荡荡中,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元化彼此交融、互相渗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着和变化着。这种发展与变化又进一步促发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激荡、交流、碰撞、吸收、借鉴、扬弃、融合与改造,进一步催发出更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文化作品,使得各民族文化在不断丰富自己内涵的同时,也丰富着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使之日新月异,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不断发展。

在这样一种浩浩荡荡的交融与发展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任何把自己禁锢、封存、隔绝起来,意欲独善其身的做法与想法,无疑都是愚昧的、不可取的。只有置身其中,勇敢面对,从这种交融与碰撞中博采众长,吸取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营养才是正确选择。问题是,面对这样丰富多彩、浩浩荡荡的海样文化大潮,如何更加方便和自如地去选择我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毕竟,就大多数人来说,直接阅读国外文化作品,依然要受诸多条件,特别是语言障碍的限制与影响。因此,不断推荐、翻译与出版更多的优秀国外文化作品给我们的民众,正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与文化出版人责无旁贷的职责。这套由江苏省翻译协会与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联手打造的《镜与灯人文译丛》,就是肩负着这样的职责,来为我们新时期的民族文化创新与未来文化发展战略服务的。

《镜与灯人文译丛》取名于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著作《镜与灯》。镜者,映像其中,意在反映外在事物;灯者,明示外物,意在指示外物的发展变化。《文丛》之所以取名于此,一者表达入选著述皆为对外在现实或精神世界的心灵映照,一者意为入选著作可提供理论上或思想上的指引。

综观世界各民族文化,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一切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研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对于光大人类文明,开拓智慧领地,扫除愚昧落后,振兴本民族文

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驾驭者。对于国外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近代民主政治与法制思想、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现代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等,我们要以充分的民族文化自信,敢于敞开胸怀,大胆接纳,在激荡中学习借鉴,在碰撞中扬弃升华,在交融中丰富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博采各种优秀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成就。我们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镜与灯人文译丛》译介西方优秀、积极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或跨学科的著作,旨在反映当前国外理论界与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和研究方法。镜,鉴也,景也。借鉴国外精华思想,领略国外学术风骚,是出版的重要使命。灯,光也,明也。引入国外优秀学术成就,照亮未来学术之路,亦是出版的重要责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秉承多年专业出版的理念,积极探索学术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举大教育概念,行大教育事业,始终致力于开发教育学术领域的先进思想,展示人文领域的先进成就。

《镜与灯人文译丛》的引进出版得到了江苏省翻译界各位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和有益指导,相信本《文丛》的出版必定会给我们的文化界与学术界带来不凡的亮点。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2014.9.19 于南京

多年前,苏嘉达·拉曼(Sujatha Raman)竭力主张我写一本明确奉献给“社会理论”的书,因为社会理论家明显与任何其他专业的人士一样狭隘,对知识社会学引进的这种反思尤其反感。实际上,社会理论轻易将其关注的问题从经验社会学中分离开来,从而使自己成为意识形态批评下手的目标。那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社会理论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兴起与意识形态批评的末期衰退相一致也就不奇怪了。相比之下,我一直坚信,最有趣的社会理论在本质上关注的永远不是理论,而是某些经验的领域或紧迫的政策问题。

我写这本书的机会源于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的鼓动,他非常喜欢我对阿多诺(Adorno)的《社会学导论》(*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的评论,后者发表在2000年《欧洲社会理论期刊》(*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秋季刊上。其本意是让我写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1959年的经典《社会学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21世纪版。本书赞同米尔斯有些偏执的政治敏锐性、他大体上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支持、他对时髦的学术官方语言(newspeak)(这里的结构功能主义已为后现代主义所代替)的反感以及他认为社会科学对等待我们的将来(现已非常不同)至关重要的坚定信念。看一眼本书词汇表中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就能梳理出自米尔斯那个时代以来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能认识的估计只有一半。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发表过本书的部分观点。然而,就呈现本书的整体性而言,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在英国华威大学就读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现代性社会学这两门硕士课程的我的学生们,此外还有在瑞典赫尔辛堡隆德大学暑期研究生学校的学生们。感谢安妮·科瓦莱宁(Anne Kovalainen)和佩卡·萨尔库恩(Pekka Selkunen),他们2002年邀请我开设向芬兰社会学协会介绍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的年度讲座。感谢戴维德·格林伍德(Davydd Greenwood)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们允许我在分别由福特(Ford)和古尔本金

安(Gulbenkian)基金会资助的课题中提出我自己的思想。过去和现在,我的一些研究生从事的工作让我接触到相关问题,我有可能忽略了。他们中有阿迈德·布齐德(Ahmed Bouzid)、奈杰尔·克里斯琴(Nigel Christian)、吉姆·科利尔(Jim Collier)、威廉·吉斯比(William Gisby)、柯克·琼尔克(Kirk Junker)、琼·利奇(Joan Leach)、比尔·林奇(Bill Lynch)、雨果·门德斯(Hugo Mendes)、詹姆斯·米特拉(James Mittra)、戈文丹·帕拉伊尔(Govindan Parayil)、彼得·施瓦茨曼(Peter Schwartzman)、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米莲娜·斯泰特瓦(Milena Stateva)、渡边麻衣子(Maiko Watanabe)。扎内尔·阿比丁(Zainal Abidin)、阿尔夫·邦(Alf Bång)、芭贝特·巴比奇(Babette Babich)、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杰勒德·德兰蒂(Gerard Delanty)、戴维·迪皮尤(David Depew)、让-皮埃尔·迪普伊(Jean-Pierre Dupuy)、阿迪提·高里(Aditi Gowri)、保罗·格里菲思(Paul Griffiths)、帕特里克·希兰(Patrick Heelan)、米尔拉·南达(Meera Nanda)、格雷格·雷迪克(Greg Radick)、格雷格·兰塞姆(Greg Ransom)、阿曼达·里斯(Amanda Rees)、弗朗西斯·雷米迪奥斯(Francis Remedios)、吉恩·罗莎(Gene Rosa)、阿诺·塞尔斯(Arnaud Sales)、齐亚·萨达(Zia Sardar)、斯卡利·西格森(Skuli Sigurdsson)、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罗杰·特里格(Roger Trigg)、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和安妮·威茨(Anne Witz)也给予了我很多灵感以及有益的批评。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前合作者斯蒂芬妮·劳勒(Stephanie Lawler),没有她我可能没有这么有人性。

写该书的初衷是因为作为社会科学龙头学科的社会学正处于认同危机中,学术界内外都有人认为该领域已经不能从人性和自然科学中汲取养分,因此质疑该领域能新增什么成果,这正是这种认同危机的集中体现。即使这个问题缺乏严肃的智力基础,它仍然有着坚实的机构基础——尤其是迫于市场的压力,很多大学非常乐意进行院系的重组。其实,要证实社会学存在的合理性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只需看看可观的科研经费和报考该学科的学生人数就行了。对于那些只关心将其需求最大化的人来说,下一个问题不是如何加强社会学,而是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满足并增加需求,社会学因此被降格为一种可以随意处置的方法,从而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政策支持的研究收入,提供用人单位青睐和认可的学位。社会学家应该拥有这门具有崇高历史理想的学科的更好基础。

社会学——更广泛地说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理想一直是实现 18 世纪启蒙运动创造“人间天堂”的愿望。这个形象的甚至有点吓人的措辞指的是一神论系统的世俗化和科学化,特许人类按照上帝的形象和外貌被创造出来。因此,其目的就是创造一个人类控制自然而不相互控制的世界。《新社会学想象力》(*The Ne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是清晰表达这个目标的最新尝试。在社会科学问世之前,人道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都认为这个目标很荒谬。一方面,在社会学催生的文化研究领域之前,人道主义者发现,人类中只有少数人适合实施控制,也就是那些作家和“经典”的权威诠释者。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历史也就是一部长期的斗争史,它一直试图抹去一神论者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别——也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早提出的“世界的解咒”。

我们不该忘记,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以及社会学更有争议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神圣三位一体”,韦伯、涂尔干(Durkheim)等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克服经典人文主义偏见的一种途径,后者打着“真正的社会科学”的旗号,认为社会科学和每一个人

相关,为每一个人服务。过去,推理一直被认为是天赐的财富,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天资被传递给人,而现在被“贬为”一种工具,特别的人可以利用它达到特别的目的。在实证主义借数据、清晰的逻辑以及能证实的程序为有效性铺平道路之前,如果说真理还没有完全被人类遗忘的话,那它往往掌握在一些像神一样地被指定的专家手中。在人文学科的独特性本身如此岌岌可危的时代,强调这些当今如此轻易被打发的运动所具有的独特的人类中心特征显得尤其重要。

诚然,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但与其他危害相比也不过如此。很难找到一个自称为实证主义者的人支持希特勒(Hitler),然而一些诠释学者和解构主义者至少来凑了凑热闹。无论如何,只要这些危害可以追溯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安排中的人,这些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给他们的后代留下可以学习的东西,那社会科学的前景始终光明。这就和另一个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世界的弊端源于一个无可救药的莫名其妙的神,或源于隐蔽的自然力,包括那些潜藏于我们身体内部的自然力。后现代状况的一个非常可悲的特征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承认追究人类行为的前因后果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可是很快就完全放弃这项任务了,其中以尼采式(Nietzschean)的“后伦理学”姿态尤为突出。对于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个姿态既不大气也不聪明,不过是放弃了责任,不敢对那些挑战和界定我们共有的人性的决策背景负起责任。

在下面的数页中,读者会注意到,我尤其重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这和我自己正在做的课题“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是一致的,后者是有关知识社会学的标准版本,旨在利用人们凭经验对有组织的探究的理解来教导我们的现在,给予我们的将来力量(Fuller, 1988)。即使在社会学家中间也存在着一种趋势:对社会学的知识存在刻板的印象,也就是将复杂的思维模式简化为对社会历史环境纯粹的“思考”,因此每种争论都是自私的。这个讽刺画面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它将历史上与一个人的定位和目标相关的问题都混合在一起了。如果人们的思维仅仅是简单反映周边的环境,那知识社会学就无用武之地了,经验主义或现象学就可以搞定。然而,人们总是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现状,总是追求更好的状态,除了热衷于将神学的权威非神秘化并篡夺神权权威,这也就是早期社会科学家对宗教的“自我超越”特性如此着迷的原因了。如果我们的知识是经验最清晰的表达,那为什么在生活中总是要得更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加优雅地接受忧伤、失望、失败和死亡?因为它们是事实,所以我们总是愿意把它们变成社会政策和政治行动关注的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想要改变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应对它?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界定社会科学合理性的问题,知识社会学因为不断地提出这些问题也值得肯定。

我坚定地认为,人性是社会科学的中心课题,这反映了我对学术界的早期涉猎以及后来的发展。初涉猎时该课题正开始走下坡路。1950年至1975年的这段时间里,有两种趋势是被载入史册的,强调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提出的“福利国家”的深刻性,与整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相一致,这是世界各地普遍破坏力史无前例的扩张。就权力政治而言,在一个多数人从根本上互不信任的世界里,威胁和贿赂就成了两种可以选择的威慑策略。然而,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之一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在“一战”后曾经提议,与战时经济相关的再分配伦理即使不在“永久性紧急状态”也是合理存在的,“永久性紧急状态”一词是德语,最早由俾斯麦(Bismarck)提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来用它来捕捉“冷战”思维(Proctor, 1991)。的确,在“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蔓延,有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剩达到了平衡,哪怕是在英国和美国等有着根深蒂固的自由传统的国度。我跟踪并判断这种感知力的衰退,目的是为了重新展望“社会感”,确定适合研究它的科学并致力于该科学的研究。著述本书时我还为我更渴求的感性留下重要篇幅:联合国试图将世界聚焦到各国联合起来,而不是在敌对状态下能更有效处理的问题上。萨克斯(Sachs)就是最近很卓越的一个表现,其甚至承认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是我们的精神祖先,这个名字也会在书中出现。

期待将这些学术上的问题延伸到“机构对结构”、“微观对宏观”以及“建构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者”等领域的读者会非常失望。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二元体在社会学方面没有任何突出的特点,对于21世纪该学科遭遇的困境也没有什么帮助,这纯粹是因为这些二元体认为社会学的合理性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立场也许对于那些易受影响的在校大学生有用,但对于那些熟悉当代知识潮流的人来说就不太能说得过去了,在第一篇中我阐述了这个观察结果。第一章阐述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社会”作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其生动性已逐渐消失,而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致上算是同一世界历史运动的政治和哲学体现。在第二章里,在将智人变成正常的人类的重大课题中,我将我们所处的这个濒临迷失的世界描述为一个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第三章和第四章阐述了作为该课题政治工具的社会主义的兴衰,将关注点引向人的生物性在界定福利问题方面所起的存在争议的作用,尤其是在人们对动物以及更广泛的生态的关注的增长与为人类的福利设定的公共资金的缩减达成一致之后。第五章强调了英国社会学传统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对这个讨论的贡献,在各主要国家的传统中,仅英国的就够对付达尔文(Darwin)了,这促进了社会学的科学和政治相关性,福利社会是其留下的最主要的遗产。美国的传统是另外一个同样渗透着达尔文主义的国家传统,但是其早期的社会

学家将其带向了完全不同的科学和政治方向,主要代表有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自由资本主义、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的平民优生主义、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论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生态隔离主义(Hofstadter, 1955)。最后,第六章阐述了当代有关社会学的论述如何使得前面五章提出的问题变得更加模糊。

第二篇关注生物学影响并质疑社会科学的各种方式。第七章表明某些生物学观点是如何由社会学传统的主流预先假设的,有的时候心照不宣,更多的时候是类推。第八章将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确认社会科学家与人类生物学交战的更好和更拙的方法。这里有个教训,社会学家们应该不再遵从生物学家的权威——那些鼓励我们和不鼓励我们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生物学家们。社会学家需要对生物学知识进行独立理解,尤其是在生物勘探兴起的情况下——后者是分子生物学、医疗关怀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灵活结合。第九章介绍的是在一个见证社会主义命运逆转的时代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试图用达尔文代替马克思,作为政治进步的科学基础,这里是需要对那些致力于保持社会科学尊严的人敲响警钟的地方。辛格的“达尔文左派”造成的从“人类”到“人性”再到纯粹的“自然”的规范退却将在第十章做进一步阐述,将“同情”这个概念的跨物种迁移作为道德关注的基础。

第三篇将这个社会世界近期的再生物化投射到更大的世界历史画面上。第十一章将这个问题提炼为世界观的冲突,尽管就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而言,这种冲突公然向界定全球紧张局势的当代动向提出了挑战。的确,我将伊斯兰教和西方的问题归入“人类学”的文化问题,这门科学一直渗透着一神论,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传统中的中心地位经常被忽视。然而,“达尔文左派”在我称之为更加“因果报应”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里,人类重新被纳入自然历史。第十二章明确指出是什么正处于危险之中,也就是将人类的特权作为价值的本质取向。“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是当代信奉基督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民众未能尊重这种特权而相互妖魔化的方式,这点可以帮助我们应对“9·11”,并警醒我们注意,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际发展的政策已经从减轻人类痛苦这个具体的目标转到更加广泛的全球生态议事日程上来,其中人类所起的作用尽管重要,但相对削弱了。这些问题将在第十三章继续讨论。第十四章将这种转变置身于“种族卫生”的复苏中,“种族卫生”是一门生物社会科学,因为和大屠杀密切相关,现在丧失了信誉,尽管如此,在近年来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膨胀的控制的呼吁中仍然有它的声音。我从反事实的角度提出,如果纳粹没有着手进行大屠杀,他们很有可能带我们向当今生态活跃分子提出的“天堂”更近一步。

最后,本书提出,“达尔文左派”、社会生物学的附属学科以及进化心理学绝不可

能让社会科学消失,因为这些准继承领域使得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变得更加不确定了。然而,它们的确促使我们去思考,人文学科对生物学的依赖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在完全不同的哲学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人工智能、电子技术科学以及“法人”(如“团体”或“公司”)等传统中,都可以看到强烈的反生物潮流,其中“法人”属法律范畴,社会科学最初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或许这些潮流的某种结合可以将重新想象的社会学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正如总结中明确指出的,我认真接受这个有表面证据的主张,认为生物科学可以解释社会生活,特别指出,我并不否认将社会学降格为生物学的假定基础,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物种,所有的社会生活始于个体之间的交易,而个体身份的确认则依赖于家庭的成员关系。按照这种逻辑,最像家庭构成的社会结构(如原始的种族)是最有可能幸存下来的。举一个这种思路的例子,国家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人为地试图在个体之间保持复杂的关系,而这些个体本身互相之间并不存在“自然”的关系。因此,我更愿意把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关于现代进化理论的“自私的基因”观看成社会科学为了保持自身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而必须克服的负担,我回应的观点是,让某些动物“人性化”的是它们参与了大规模的合作课题,后者公然挑战世界的基因观,主要是因为它们已经成功地掌控了选择的环境,足以使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效果无效,有时甚至可颠倒这种效果。这些社会建构起来的选择范畴于是就成了个人身份确认的主要来源,“幸存”一词也因此被重新界定。

人类有个粗浅的特征,比起对他们的基因,甚至是家庭世系的了解,人们总是更加关注思想,甚至是声望的代代相传。任何有物质基础的思想都为人们展现了一丝尽管是有悖常理的希望,的确,这个观点通常很难被人们接受,包括社会科学之外的学术界人士。一方面,它帮助阐释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知识社会学的怀疑,另一方面,它同样解释了历代以来人们为什么总是不愿意接受对人类状况的纯生物学阐释。

就“自然选择”而言,历史上有三个反生物理念的明显先例:宗教的、学术的和政治的。首先,在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愿望基础上,奥古斯特·孔德明确提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旨在让某些动物(智人)更接近于神的救赎。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感兴趣的是根据个人成就来独立考察候选人,这样就削弱了功绩和家庭出身之间的任何联系,这是第二个,也是更加实在的先例。阐释了长期以来社会学对霍布斯(Hobbes)的迷恋的第三个先例最为广泛,即公民权制度,强加给个体相应的义务,如选举、纳税和兵役,这些义务又促使他们参与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的受益人远远不止是他们自己和亲属。

最后,在着手完成摆在面前的这个任务之前,社会学实践在我的“再想象”中如何

不同——或是否有不同之处——的一些相关评论已经就绪。“社会学”一词无疑要找回它原有的规范力量,通过培养调查对象的集体自我意识,该学科的从业者对所研究的社会构成做出贡献。这样的描述自然最适合当今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然而我相信,甚至——或尤其是——更加经典的实证主义者对社会研究采取的“假说演绎法”应该在这里露面。比起将科学和政治完全分开,更重要的是社会学的主张相对于其目标人群来说很多都是可以测试的。在这方面,认为实验是研究的“金”标准的实证主义方法有两个被低估的很大的优点,其一是它们明确区分社会学家的主张和受试对象表达或透露的有关自己的情况,其二是它们倾向于将受试对象放在跟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稍微不同的情境中。前者为调查者的可描述性和自主性提供了基础,从而抵制了不负责任的口技的诱惑,而后者则指向了受试对象成为他人以及更理想的超越自己的能力,因此避免了对变化前景的自满悲观。实证主义这种赋予力量的进步一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然而,正如我现在开始努力去证实的,它值得被重新归入新社会学想象力的一部分。

目 录

前言	001
简介	001
第一篇:21 世纪对社会学的拼命寻求	
第一章 学术界不死族的故事:社会的神秘消失	003
第二章 处于危险中的社会科学:该危险的发展简史	013
第三章 社会主义作为难以捉摸的合成体处于社会科学的中心地位	020
第四章 继承问题和社会主义向自然主义的最终撤退	029
第五章 福利的恢复和英国社会学的重新发现	039
第六章 插曲:当今社会科学的奥威尔倾向	046
第二篇:社会科学的生物学挑战	
第七章 经典社会理论隐藏的生物学过去	061
第八章 当今,区分社会学和生物学至关重要	070
第九章 谨防拥有左翼天赋的达尔文主义者:争当马克思继承者的斗争	084
第十章 谁(或什么)值得我们同情?	093
第三篇:人类是我们这个时代濒于灭绝的物种	
第十一章 科学与宗教方面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斗争	105
第十二章 理解原教旨主义对世俗主义的反击	118
第十三章 因果报应的世俗化:发展政策的达尔文倾向	129
第十四章 我们会成为天堂里的纳粹吗?	146
结论:真的没办法逃离人性吗?	156
词汇表	164
参考文献	171

第一篇

21世纪对社会学的拼命寻求

